

江南

人文



明代顾绣东山图卷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中国的丝绸发展史，江南是一个关键地区；江南的经济，丝绸是一个重要领域。

江南丝绸，溯源于远古，崛起于唐宋，到宋代则三分天下有其一，至于明清时期，则蚕桑之盛、丝绸数量之多、质量之优、品种花样之繁、用途之广和在海内外声誉之隆，为全国任何一地所不及。直到现在，江南丝绸仍是我国对外出口的重要商品。

丝绸文化如何浸润江南的日常生活？不妨让我们放眼传统诗文、绘画、戏曲、古典小说等中国传统文艺样式。

江南丝绸这样浸润了诗画戏文

潘惠英

古代诗画 中的江南丝绸

白居易的《缭绫》，似一篇关于越州特产缭绫的说明文；楼璩绘制《耕织图诗》，其中织图24幅，详实记录南宋蚕桑业和丝织业生产的各个环节

明清小说 中的江南丝绸

《红楼梦》中的丝绸故事，最令人惊艳遐想的，也许首推那枚软厚轻密又极诗情画意的“软烟罗”，而最令人怜惜喟叹的，则是香菱情解石榴裙

传统戏曲 中的江南丝绸

《牡丹亭》里，因情深而病笃的杜丽娘在素绢上自描春容；《桃花扇》中，侯方域接到冰绡汗巾所包樱桃的这一风雅细节，成为他与李香君定情的开端

中国是农业大国，一直十分重视农桑，古典文艺作品中自然有不少表现蚕桑劳作或描写蚕织妇女的现实生活。南宋画家牟益的纸本水墨画《捣衣图》绘南宋诗人谢惠连《捣衣诗》之诗意，画中庭院秋深，32位女子捣练、裁衣、缝衣、寄衣，到卷尾缓缓展现全卷主题：“纨素既已成，君子行未归。裁用剪刀，缝为万里长。盈筐自余手，幽絷侯君开”，不仅呈现了从捣制衣料到裁衣、寄衣的完整过程，也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她们良人从军久不归的闺怨哀伤——“捣衣”是六朝和唐代诗画的常见题材，指将生绢等衣料铺在平滑的砧板上，用木棒敲至柔软熨贴，以便于剪裁缝制衣服，而非非望文生义的“用木棒敲打清洗衣服”之意。勤劳的蚕织妇女们创造了绚烂多姿的丝绸产品，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绢本设色，工笔精细地描绘了高官显宦之家晚宴欢会的场景，其中的仕女们绮罗锦绣，衣袂鲜活，绚中出素，妩媚高雅，帘幕和帐幔也无一不是绚丽多彩的丝绸制品。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体恤民生之多艰，常常在诗歌中反映和揭露现实，如知名度很高的“一丈毡，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便是其新乐府诗《红毡毯》的结尾之句。诗曰：“红毡毯，择蚕缂丝清水煮……彩丝茸草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头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百夫同担进官中，线厚丝多卷不得……”，以极其写实的风格强调了宣州红毡毯的绵软厚实，其制作之不易亦显而易见。白居易的另一首新乐府《缭绫》，则似一篇关于越州特产缭绫的说明文：“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纨与纨绮。似应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描述缭绫的颜色为白色。当时浙东一带的缂以平纹地上显斜纹花或长浮花为主，其表现效果正是地部稍暗如铺白烟，而花部较亮似堆白雪。“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一句详细而到位地指出了缂织物先后染色和工艺特点，就是先把白丝织成面料，再染色，织物的图案完全依靠花和地两个部分组织结构的变化来实现。其中，“云外秋雁”是唐代十分常见的官服用纹样，“江南春水色”是一种用蓝草染成的介于蓝绿之间的碧色，白居易在其《忆江南》中曾道“春来江水绿如蓝”，描写的就是这种颜色。“异彩

奇文相映晚，转侧看花花不定”，准确地描述缂织物图案若隐若现的特点——图案根据光照角度时强时弱地呈现出来，甚至时有时无，有变幻奇炫的效果。如此美丽的织物出自越地织女之巧手，诗人在最后不禁感叹：“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缙与帛。丝细缙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也应惜”，也就是辛弃疾其志，扎扎实实地照应了副标题“念女工之劳也”，诗人关心民瘼的拳拳之心亦跃然纸上。

有宋以降，江南丝绸业更盛。大词人柳永在其《望海潮》中说杭州“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牛希济的《生查子》结句曰“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替可爱多情的绿裙女子表达了绵绵如春草的深情，轻灵生动而又感人至深。南宋时，楼璩任于潜令，深感农夫、蚕妇之艰辛，绘制《耕织图》45幅，其中包括耕图21幅、织图24幅，详实记录了当时蚕桑业和丝织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成为后人研究宋代农业最珍贵的资料，之后历代都有各种不同的摹本流传。较著名的有南宋刘松年的《耕织图》、元代程棨的《耕织图》，明代初年编辑的《永乐大典》曾收《耕织图》，但已失传。明天顺六年(1462)有仿宋刻之本，虽也已失传，但日本延宝四年(1676)京都狩野永纳曾据此版翻刻，故而现在都得以狩野永纳本《耕织图》作楼璩本之代表。

清康熙帝南巡时，江南士子进献藏书，其中就有楼璩所绘的《耕织图》，他便命焦秉贞在此图基础上重新绘制《耕图》与《织图》各23幅，其中《织图》表现了养蚕从蚕蛋、采桑到成衣的完整生产过程。在每幅图上，康熙还御笔亲题七言绝句及序文，其中《织图》包含的内容有：浴蚕、二眠、三眠、大起、捉绩、分箱、采桑、上簇、交箔、下簇、择茧、密茧、练丝、蚕蛾、祀用纹样，“江南春水色”是一种用蓝草染成的介于蓝绿之间的碧色，白居易在其《忆江南》中曾道“春来江水绿如蓝”，描写的就是这种颜色。“异彩

中国是衣冠之国，礼仪之邦，对服饰穿戴十分讲究，而服饰也显示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和性格气质，所以，小说家们往往非常重视对人物的服饰描写。在明清小说里，穿着丝绸的主人公车载斗量。如明代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写张彦“自己打扮起来，头戴一顶时样纶巾，身穿一件银红吴绫道袍，里边绣花白绫袄儿，脚下白绫鞋，手中执一柄书画扇子”；明末清初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第十四回《因困而起盖福堂，死囚牢大开寿宴》：“只见一件哥儿穿着头，上穿一件油绿绫小夹袄，一件酱色罗绸小绵坎肩；下面穿着绿绸夹裤，一双天青红丝丝女靴”；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三公子见他无衣服，却又取出一件浅蓝绸直裰送他……”



清代盘金彩绣狮子纹荷包，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值得强调的是，丝绸之于江南的人们，决不仅仅是身体的遮羞御寒之物，而是沉浸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仕女手中的团扇是绢面的，书生轻摇的折扇扇面也往往乃绫罗所制；用于书写或函套书画的帛是浅黄色的“细”，故书籍称细纸；女儿家捏在手中或被在旗袍襟里的，是撒了几滴香水的丝帕，或曰绢头，步步芬馨，风情万种；家居必备的窗纱、门帘、帐幔也多选丝绸制作。当然，缂罗绸缎锦绣衣饰和成匹的丝绸料子更是上好的嫁女之物或馈赠佳品，例如清代吴敬梓长篇《儒林外史》第十回《鲁翰林怜才择婿 蓬公孙富室招亲》：“鲁编辑那里也设席相留，回了允帖，并带了庚帖过来。到第三日，委府办齐金珠翠首饰，装蟒刘丝缎罗衣服……”，李绿园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第十四回《碧草轩父执说论 崇有斋小友发言》：“王中协同同相公到街上，各贺礼四色——银花二树，金带一围，彩扇一匹，杭纱一匹”，而在古典名著《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而兴农桑，江南丝绸生产崛起于东南一隅。吴越时期江南优质的丝织品也通过对外交往的形式出现在海外。当时杭州、明州等不但是繁华的工商城市，而且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江南第一次以丝绸为中心的地位屹立于全国丝绸业中，成为全国三大丝织中心之一，是在宋代。当时，江南丝绸业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桑树栽培和养蚕技术已有专著进行初步总结；丝绸品种大为增加，花色较为复杂，染色水平大为提高，新品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里，江南甄府给贾府的礼单上写着：“上用的妆缎蟒缎十二匹，上用各色缎十二匹，上用各色纱十二匹，上用官绸十二匹，官用各色缎纱绸缎二十四匹。”

有道是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多姿多彩的戏曲世界里，自然也不乏丝绸的情影。在黄梅戏《天仙配》中，七仙女感慨“神仙岁月太凄凉”，偷偷下凡，与勤劳淳朴的董永结为夫妻。他俩同去员外家上工，却被百般刁难。七仙女自称“能洗衣浆衫，又会织布纺纱”，员外趁机会要她一夜之间织成四匹锦绢，如织不成，三年长工要再加三年，如织得成，则三年长工改成百日。董永见员外故意给了一捆无头乱丝，十分担忧，连道“这便如何是好”。七仙女胸有成竹，召唤姐妹们下凡，一边唱着“五更调”，一边从容织完了四匹锦绢，百日后开开心心地夫妻俩双双回家还，令观众在抒情欢快的黄梅调中与剧中人一起喜笑颜开。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不仅是对平凡美好日子的咏赞，也反映了织布纺纱是我国古代女性的主要劳作技能。

明代剧作家梁辰鱼的传奇《浣纱记》原名《吴越春秋》，讲的是著名的美女西施的故事——越国大夫范蠡与诸暨苎萝西村的浣纱女施夷光在溪边偶遇定情。吴灭越，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图谋复国雪耻。范蠡献计，将西施送给吴王夫差，果然令夫差沉迷酒色，荒废政务，最终国破自刎。大功告成后，范蠡携西施泛舟归隐。在该剧第二出《游春》里，西施唱着[商调·绕池游]照例去溪边浣纱：“苎萝山下，村舍多潇洒，问莺花肯嫌孤寡。一段娇羞，春风无那。越清明，溪边浣纱”，遇到范蠡，二人以她所浣之纱定情，范蠡便唱[双调·玉抱肚]：“行春到此，趁东风花枝柳枝。忽然间遇着娇娃，问名儿唤作西施。感卿赠我一绺丝，欲报惭无明月珠”，剧情由此开端，曲词亦明确勾连剧名，颇妙。

有趣的还是，除了《浣纱记》，红氍毹上还有不少剧目的名称也自带丝绸字样，如昆剧《白罗衫》、越剧《香罗带》等等，而以绣荷包、锦囊、丝帕、纨扇、香袋等定情的爱情故事，更是比比皆是。戏服和道具，也多有绚丽的丝绸制品。



海宁皮影戏，也称蚕花戏，是浙北蚕俗在民间艺术的体现。图为海宁蚕花戏剧具，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黑龙江博物馆藏南宋《蚕织图》局部

中国的丝绸发展史上，江南何其浓墨重彩

自夏商周三代，经秦汉魏晋到南朝，江南丝绸生产经历了由中落到起步的历程。三国吴时蚕桑业得到重视，江南地区首次出现了官营织造机构，丝绸业从生产到外贸、从生产规模到技术水平，都开始有了起色。唐代随着全国经济中心的形成，江南丝绸业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外地先进生产工艺，品种增多，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在全国的地位不断上升。五代十国时，南唐、吴越国以币帛向北方王朝买平安，弱兵戈

而兴农桑，江南丝绸生产崛起于东南一隅。吴越时期江南优质的丝织品也通过对外交往的形式出现在海外。当时杭州、明州等不但是繁华的工商城市，而且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江南第一次以丝绸为中心的地位屹立于全国丝绸业中，成为全国三大丝织中心之一，是在宋代。当时，江南丝绸业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桑树栽培和养蚕技术已有专著进行初步总结；丝绸品种大为增加，花色较为复杂，染色水平大为提高，新品

迭见；脚踏车基本定型，过糊方法业已采用，束综提花机结构齐备；官营织造机构普遍建立；民间丝织业家庭副业地位迅速上升，小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生产较为普遍，专业机户应运而生；丝绸贸易极为普遍，商人活跃，线路日辟，大宗丝绸在全国为数独多。

元代，是江南丝绸业由中心向重心地位的过渡阶段。从明中期到清中期，相对于全国蚕桑生产不同程度的衰落，江南一隅的蚕桑生产继续发展，并形成商业化与专业化的特色。十九世纪中叶，随着生丝出口的大量激增，农民为利润所刺激，江南蚕桑生产地域上更为扩大，农家蚕桑生产更为普遍化，商业性特征更为突出。江南蚕桑生产独盛的局面成了该地丝织生产特别兴盛的有利先决条件，商业化与专业化的特色体现了蚕桑生产在当地农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战后蚕桑生产地域扩大的过程，则是其重要性更为突出的反映。（本版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